

RIDLEMISHI

[英] 理查德·迪肯

日谍秘史

日 谍 秘 史

〔英〕理查德·迪肯 著

姜文灏 赵之援 译 吴妙发 校

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

Richard Deacon
A History of Japanese
Secret Service

Frederick Muller Limited,
Dataday House, Alexandra Road,
Wimbledon SW19, Great Britain, 1982.
本书根据英国弗雷德里克·穆勒图书公司1982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吴 波

日 谍 秘 史

〔英〕理查德·迪肯 著
姜文瀚 赵之授 译 吴妙发 校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 京 印 刷 二 厂 排 版
河北省新城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9.75字数：215,0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

书号：3003·1694 定价：1.30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理查德·迪肯是位英国人，真名叫唐纳德·麦考米克，是个著名的谍报史作家。他曾先后撰写了《英国谍报史》、《苏俄谍报史》、《中国谍报史》和《以色列谍报史》、《无声的战争：西方海军谍报史》等书，本书是其新作。据说，作者在着手本书著述的过程中，曾进行了广泛的资料搜集和采访工作，并得到日本政府的合作。本书问世后，在日本国内亦受到重视，1983年，日本《朝日新闻》曾予以翻译连载。

纵观日本历史，我们知道，从甲午中日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半个多世纪，正是日本觊觎海外领土，加紧侵略扩张的时期。无独有偶，也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日本的谍报活动达到了它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日本间谍的许多重大行动都是直接服务于它侵略中国、朝鲜和争霸太平洋的目标的；他们不遗余力地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军事、政治活动的马前卒，是其扩张政策的重要帮凶。关于这些史实，作者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都详有叙述，很有参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陈述当中有时采取了一种“以成败论是非”的态度，不止一次对日本谍报活动的成功及其手段表现出美化与赞赏，而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就这些谍报活动的侵略本质予以揭露；这一点，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加以鉴别。另外，对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些地名，作者往往沿用当年日本帝国

主义分子的称呼。如把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制造的傀儡政权，称之为“满洲国”；又如把我国东北地区或部分地区称为“北满”、“南满”，甚至在我国解放后仍然称“满洲的哈尔滨”等等。考虑到对当时历史状况的叙述，我们就采取了直译的方法，未加删改，亦请读者注意。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对书中涉及到的历史事件、人名、地名，我们都尽力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加以查证核实，力求准确。但鉴于英语和日语语音上的差异，以及书中出现的一些拼写错误，加之译者水平有限，故书中还难免出现一些疏漏，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汪淼同志参加了本书部分章节的翻译，谨在此表示衷心谢意。

本书在出版中，对个别内容作了删节。

译者

目 录

1. 序言.....	(1)
2. 统一日本列岛的间谍大师.....	(11)
3. 英国间谍.....	(21)
4. 秘密社团：谍报活动的鹰犬.....	(31)
5. 明石大佐与黑龙会.....	(45)
6. 日俄战争.....	(56)
7. 福岛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之行.....	(74)
8. 觊觎中国.....	(90)
9. 第一次世界大战.....	(102)
10. 川岛：满洲冒险家.....	(111)
11. 营救沙皇计划.....	(122)
12. 密码战.....	(137)
13. 在中国的日本浪人.....	(148)
14. 土肥原将军和川岛芳子.....	(158)
15. “思想警察”.....	(174)
16. 在美国的海军谍报活动.....	(186)
17. 查理·卓别林的贴身男仆.....	(197)
18. 窥伺东南亚.....	(213)
19. 日本境内的苏联谍报网.....	(223)
20. 珍珠港和那以后.....	(233)
21. 密码战的惨败.....	(245)

22. 重整旗鼓·····	(257)
23. 战后谍报·····	(265)
24. 谍报：为了经济繁荣·····	(276)
25. 智力指数比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	(290)

1. 序 言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故上兵伐谋，……
其下攻城。”①

孙子

我已经撰写了英国、俄国、中国和以色列各国的谍报史，现在又把这本日本谍报史呈献于世；在它们中间比较一番，力图从中得出一些有教益的结论，将是一件有趣的事。

开章明义，第一点我要说明，我对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方国家谍报史的探索，要比我研究英国、俄国和以色列的谍报史深入得多，所耗时日也持久得多。其部分原因是东方国家从事谍报活动远比西方世界历史悠久；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方国家间谍的败露落网，也远不象西方那么层出不穷。也许正是后面这一点使西方人对东方的间谍不屑一顾，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日本人谍报活动的能量，在这许多年里一直如此遭人贬低。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谍报活动，向来是许多论著的课题，这些书中记述了它们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成就。然而日本的谍报活动却一直无人问津。某种程度上这是它被人轻视的结果。但也可归因于以下事实：本世纪前半叶中，日本人的

① 参见《孙子兵法新注》第二十八页和第二十二页。中华书局版，1977年。“伐谋”处原文为句号，但在史籍中此段话全文是：“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中间的两句原文未写出，所以用了省略号。——译注

大量谍报活动，都是由官方保安机构之外的秘密社团一手策划的。

尽管呈现在历史学家面前的不利条件是显而易见的，但关于上述秘密社团的活动，却保留下来大量的文件案卷，当然这些社团早就被取缔了。日本同别的国家不一样，他们认定间谍活动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是报效国家的职责，甚至在日本的参考书里也毫不掩饰这一点：他们的一些杰出公民曾参加过谍报活动。比如，在一本日本出版的《名人录》中，就有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记载：

“石川伍一，间谍。生于1866年，卒于1894年。受命赴中国活动，到过蒙古边境一带。中日战争^①中在华积极活动，后被中国人抓获，在天津被处决。……”

在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时候，有一点应该说明：虽然我的祖国和日本曾是交战国，我也曾亲自投身于这场战争，但我对日本人民不抱偏见。这既不是事过境迁后的清醒，也并非单纯出于对日本人民遵守纪律的优秀品格怀有敬慕之心；正是有赖于这种品格，他们靠着辛勤的劳动和富有想象力的事业心，在战后一片废墟上创造了经济上的成就。

客观公允乃是一切谍报史著作应该遵循的准则，但在作品问世以后，这一点却不能轻易得到读者的承认。过去，持批判眼光撰写英国谍报史可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情，直到近些年来情况才有所改变。追溯到1932年，已故的康普顿·麦肯齐爵士就因为他的著作《希腊忆事》的关系，在伦敦中央刑事法庭被指控触犯了官方保密法，结果这本书被禁止出版。检察官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指控麦肯齐泄露了“难以捉摸

^① 即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甲午年，光绪12年）发生的中日战争，是由于日本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海陆军进行挑衅而引起的。——译注

的辅音字母‘C’，使人们知道了这个字母表示谍报机构长官（Chief）”的意思，现在看来，这种事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而麦肯齐竟因此被罚款一百英镑！

值得庆幸的是，在今天从事谍报史著述的作家，已经不象当年那么自身难保了。一般说来，人们都承认，如果在那之前的几年当中，谍报历史不是被严格地视若禁区的话，过去三十年间出现的一些严重失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在这方面，日本人不象英国人那么伪善。对自己的同胞在谍报史上的所作所为，他们要慷慨大度得多，乐于提供线索。为了客观地展现日本的谍报活动，我们需要记住，日本人在三十年代所干下的富于侵略性的谍报勾当，恰恰可与英国人在著名的间谍大师诸如伊利莎白统治下的沃尔辛厄姆和克伦威尔时期的瑟洛之流领导下所进行的谍报活动相媲美。这两者都处在一个加紧拓展帝国的时期中，一个是要建立大英帝国，另一个是建立大日本帝国。

但是，为了彻底地了解历史真相，在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日本实际上只花了五、六十年的时间，就从十七世纪跨进了二十世纪。1840年时日本的生活水平大致同英国1640年的生活水平相当。到了1910年，它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文明的现代世界强国。在谍报领域里，日本人千方百计通过捷径及时地赶上了其他大国，靠的是许多效忠帝国的秘密社团，辅助他们的官方保安机构的日常工作。

就世界各国的谍报机构比较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共同的特征。它们各自的独到之处才是最能发人深省的。以色列谍报机关的宗旨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争取以色列的生存，也许正是这个孤注一掷的目标，使它成为现代谍报机构中效率最高的佼佼者。苏俄致力于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推行一套扩张政策。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近乎白手起家，阅历不足，除了战时的战略情报局的经验以外别无他有，至今它仍力图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一支雄心勃勃但却不甚精于此道的间谍大军两者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英国的谍报机关，至少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已由于一味热衷于保守秘密而受害不浅。事与愿违，它非但没有能够严守机密，反而变得更加容易被俄国人的渗透活动所破。

中国的谍报机关是最令人高深莫测的了。尽管它隶属于政府，但却全然不同于克格勃或苏联谍报机关的任何分支机构。在以往的二十年间，它愈益倾向于避免从事侵略性的、非法的谍报活动，而主要通过合法渠道获取情报。例如，中国在掌握自己研制核武器的知识的过程中，就全凭与它在海外的所有物理学学者和科学家保持不间断的密切接触，以及连续不断地积累起所有见诸于报端的有关资料。这样的办法可能会使它耽延时日，远远落在苏俄的后面，但是耐人寻味的是，没有发现过一起中国人利用行贿或其他手段，唆使外国科学家泄密的事例。

日本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谍报概念比其他大国更广泛，也更富有想象力。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有日本人那样强烈的求知欲，渴望着充实自己。这一点始终是日本谍报思想的基础，也是日本人生活其他方面的支柱。今天日本已跻身于世界上最伟大的强国之列，靠的是搜集情报。换言之，就是使谍报活动为经济繁荣服务。从长远看，如果西方世界对日本人的这个经验给以足够重视，并加以利用，那末将会受益无穷。

日本人从事情报搜集活动，得自2,450年前的中国兵法家孙子的启示，他曾阐述了自己的谍报技巧。本章开头部分援

引的那段名言，就出自他的著作，正是这段话为一次又一次的日本谍报机关奉为主旨。

许多日本学者颂扬了孙子给他们国家的启示，他的著作《兵法》揭示了许多谍报活动的原理。令人惊讶的是，就是在技术进步的今天，这些原理仍然不失其应用价值。日本人不仅研习《兵法》，而且不断地发挥了孙子的理论，并把它融汇到自己独具匠心的风格中去。我们可以在日本无数将军的讲话和手稿中，发现孙子思想的烙印。即使在中世纪，他的“上兵伐谋，其下攻城”的立论，就已经被一些军阀所接受。后来在杰出的日本帝国统一者丰臣秀吉统治时期，这个思想成为他所制定政策的主要内容。

前英国驻日武官马尔科姆·肯尼迪上校，曾就日本历史的各个方面作过广泛论述，他认为日本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谍报活动取得成功，主要应归因于日本“对中国的两位兵法家吴起和孙子的学说，进行了世世代代的不懈研究”。^①直到日本人对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攻击，他们搜集情报和实际运用情报的策略概取自《兵法》。

在日本人引进外国人思想的时候，他们总要加以改进。这样日本的谍报活动，往往比对手技高一筹。有时候日本谍报机关有意识地明目张胆采取行动，露出痕迹，用假象掩蔽他人的耳目。另外一些时候日本人又故意保持低姿态，使外国机关里那些自视颇高的官僚们，自欺欺人地得出结论：在日本从未存在过一个强有力的谍报组织。

为了了解古往今来日本谍报机关的动机，我们尚须品评一下日本民族个性中的两个独特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它的强

① 《日本历史》，马尔科姆·D·肯尼迪著。

烈的独立感和自主精神，正因为此，几个世纪当中日本闭关锁国，独处一隅。这样可能会使它久久处于落后状态，但也因此加强了它的民族个性，赋予它争取生存、培养人民爱国主义的强大动力。第二个因素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强烈的求知欲，渴望一切知识的好奇心。这一点补救了它早先的孤立主义倾向，意味着一旦日本对外接触，就能以惊人的速度赶上其他国家。

十二世纪时，日本的主要统治者是幕府，这是个军人组织，它的大本营设在今天的日本首都东京附近的镰仓。就在幕府当局决意推行锁国政策的时候，统治者对外邦人的敌意开始在民间蔓延开来。在此以前，日本人对海外的来访者，一向是彬彬有礼、殷勤好客的。在德川幕府军人政府时期，当局招募了一支庞大的间谍队伍，派这些人长年周游全国各地，窥探民间对当局的反叛迹象和不满情绪。偶有出言不逊或者举措失当，就会招致当事人锒铛入狱，甚或株连全家。刺探告密之风遍及全国。

当时在日本有一支精锐的间谍部队，其成员通常是从武士，即贵族阶层中招募来的，全都精通忍术。^①在和英词典里，忍者就是“擅长隐身术的武士，主要从事谍报活动。”^②

然而，尽管幕府为了搜集情报能运用各种策略，由于日本人对一切事物都抱有天生的好奇心，因此间谍常被他们的同胞和外国人留心提防，提心吊胆留意间谍的情绪常常笼罩着这个国家。

日本人的学习热忱甚至表现在热衷占卜，即希图预知未

① 忍术是日本武士时代的一种隐身术，使人来无踪，去无影。——译注

② 忍者就是精通忍术的奸细，在武士时代，着一身黑衣服，全身只露出眼睛，行踪诡秘。——译注

来。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了，于是，在一些圈子里人们把未来学看作一门科学，世界上许多地方还成立了各种研究所。用计算机来分析未来的发展趋向。如果说今天的日本确在这类预测技术方面居于领先地位，我们只消回顾一下公元六世纪的景况，就可找到线索。

古时候，占卜先生们被人称为阴阳师，他们不仅是僧侣的一个支派，在奈良时期还享有官府里谋士的地位。奈良前期他们在朝廷里专司卜筮之职。可以说，这些人是原始谍报体制中的关键环节，因为他们不仅负责预卜来日的发展和事端，而且要就呈递上来的情报作出分析。当时的人们认为谍报断然离不开占卜，为此朝廷还设置了一个专司占卜职能的机构，品位与内务省的下级机构相当。

阴阳师们实际上就是一批朝臣，其职责是给太政官出谋划策，预卜吉凶。这样一来，朝廷的令出计行就是由这伙人的悟性来左右的，这种悟性的产生，主要来自日本人对中国占星术的灵活运用。日本人把天图分成黄道十二宫，与中国的历法黄道图毫无二致。阴阳师创立了占卜方法大约二十六条，被朝廷列为钦定占卜之术。

天武天皇在位十三年，于公元六八六年驾崩，他生前不但建立起中央集权政府，抑制了藩镇势力的影响，而且扩展了佛教的传播，还设置了为敬天神道、佛教和皇室家族三者之间特殊关系正名的神社。天武对天文知识颇有兴趣，那个年月里，人们对这方面的了解不过就是占星术而已。他还着手编纂了日本的第一部史书《古事记》。阴阳师在当时的影响，可从这些人精心奠立的同神社的关系中窥见端倪。神社的权势实际上要高过太政官，在阴阳师里面则有一个世袭的占卜机关，直接向神社述职。对比英国政府里面的类似情况

来看，这层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英国谍报机关的首脑就有特权，可以同政府首相直接通话。

占卜二十六术里包括占星术和笔迹学，还有手相术、测名术（命理学推断的一种形式）、幻魔术（一种使用魔杖的怪诞占卜术）等各能自圆其说的法术。另外有些法术是与观测气象和探测地质有关的。气候占卜术（有时候人们叫它漏刻之法）通过琢磨空气、云和天气的各种征象来卜知未来。占卜二十六术里面还有一个占风术，在奈良时期这门研究风的学问尚处于原始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则经过深化付诸实战运用了。

占风术在朝廷里被视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人们认为它是海防上成败攸关的主宰。日本人刻意研究风源、风力及其影响，以求将来果真与潜在敌手兵戎相见时，知道怎样依靠这方面的知识来克敌制胜。神风就是日本人给一种风暴的命名，这种风暴十三世纪时曾帮助他们遏止了忽必烈对日本的入侵。那是1281年，日本人得天独厚赶上了好天气，只见一阵狂风大作，席卷了蒙古人的船队，使之全军覆没。自那时以来，占风术逐渐变得科学多了，不过神风的魔力已经成了日本海军津津乐道的口头禅，据说在二十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中，占风术也对日本制定作战策略，智胜俄国发挥了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神风这个词经常出现在报刊和无线电的报道里，指的是日本飞行员奋不顾身地冲向盟国战舰，与之同归于尽。海军中将大西隼治郎就用神风行动的说法来描述许多起这类勇猛又有些蛮干的攻击行动。他每向飞行员发出指令的时候，说到神风这个词就口若悬河，他把日本飞机对敌舰的俯冲轰炸，比作台风给蒙古船队的那次毁灭打击，激发起飞行员们祈望风神护佑的无限幻景。

这种如醉如痴的爱国热忱，同样激励着日本浪人（想入非非的冒险家）。他们投身于十九世纪后半叶诞生的各类秘密社团的活动。这批人一心为国尽忠，加之天生的无所畏惧，因而成为第一流的特工谍报行家。要在西方世界找到一个浪人式的人物谈何容易。浪人是个无主的兵士，跟雇佣兵差不多，但其动机全系爱国情绪所驱使，绝不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在他身上焕发着十字军的献身精神，也有雅各宾党人对信念的执着追求。这些社团组织最终构成了日本谍报机关的基础，其使命五花八门，包罗万象。这个谍报机关到三十年代时，已扩展成伸向世界各地的庞大间谍网。它取得了近乎总体谍报的战果，其成效连苏俄的谍报机关也相形见绌。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就在日本政府愈益与民主制度背道而驰的时候，它却几乎最配得上全民谍报机关的头衔。因为这个谍报机关是以全体人民为后盾的，常常就连那些同谍报活动无关的人，如工会人士和农民们也表示支持，他们的热情比起浪人和专业谍报人员来，毫不逊色。

谍报活动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各国对谍报活动的看法迥然而异。随着时代的演变，从事谍报的动机也在发生变化。虽然国防需要总是要优先考虑的因素，有时对外侵略、拓展帝国事业的欲望也可能提出更加迫不及待的要求，但在现代意义上，西方国家的谍报活动总是异常活跃，力争不落后于邻国。

简言之，谍报活动虽然频繁，但不一定都是包藏祸心。在这方面，日本靠自己狂热的求知精神，为在将来创立一个更多地致力于和平目的而名正言顺的谍报概念奠定基础。对那些愿意看到这一点的人来说，这些迹象都是显而易见的。只要在今后的二十年里不爆发世界战争，那么谍报活动就可能

单纯用来获取知识，促进经济繁荣，它可以使人们知道怎样在世界上某些地区征服食品短缺，怎样对科学和人类的行为实行管理，以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东京已经用数不胜数的方式，为未来的谍报利用指明了路径，而这些方式在许多国家里似乎仍然视同陌路。日本已树立了榜样，它的典范将会在更多的地方发挥作用。

愤世嫉俗的人们可能会说，鉴于日本人在三、四十年代的所作所为，上述的乐观看法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但是确实有过许许多多的日本政治家，一贯大力提倡为了和平目的求取知识，与其他国家实行合作。1939年5月，日本政界最开明的元老之一西园寺公望亲王对他的秘书原田熊雄男爵就说过：“明治维新以来大家都赞同，不要再用‘东方’和‘西方’这样的提法来互相攻讦。尽管明治天皇的圣意废止了东方和西方的对立说法，令人扫兴的是，右翼集团和好战分子却仍然死死抱住这一对立说法不放。”^①

^① 《原田熊雄回忆录》，第十九部分。东京1939年版。